

# 文革剪影

王士元

1973年，对我而言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我1966年就开始在Berkeley任教，但1973的夏天我还在密歇根大学短期教书。在此之前，我曾经尝试过多次，希望能够申请到一张前往中国的签证，让我能够去探望父母和年迈的祖母。然而，不管是在东京，巴黎还是莫斯科，所有的答复都是一个礼节性的“不”字 - 对不起，中国现在还不能接待访客。[只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这礼节性背后的实情和中国那时的不幸遭遇。] 所以，1973年，当我在密歇根大学接到一份访问中国的联合邀请时，实在是喜出望外。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他们请我到北京作一个系列的讲演。梦想就这样在突然之间实现了。

## 王力

我在Berkeley的老学长，赵元任教授，听说我要去北京，就让我帮他捎一份书信，信封上写道：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亲启。但在我第一个讲演中，座下并没有王力教授，于是，我就向陪同的组织者询问他的消息，提到赵元任的亲笔信。赵元任在中国当然是鼎鼎大名了，他在1972年应邀访问过北京，那时候尼克松总统刚刚离开。而且，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对于我的要求，组织者似乎很有些为难。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王力来听我的演讲了。他衣着一新，也修饰得很精神。他拿到赵元任先生的信笺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还不停地啜嚅着感谢的言辞。当时，我对王力的不幸遭遇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拘禁在牛棚中的王力是因为赵元任先生的亲笔信才得以解脱。在我终于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不由得百感交集，也才体会到赵元任先生的良苦用心。

## 朱德熙

主持我演讲的有社科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教授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朱德熙教授。由于我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中文了，所以演讲起来也比较吃力，我努力用自己很差的普通话要把自己了解的最新国际学术进展讲给中国同行们。朱德熙总是在很恰当的时候站起来，提醒大家，说刚才王先生的讲话中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他的概括相当精辟，几句话就把我讲的要害说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想，咱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学者，真是不错。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朱教授和大家到飞机场给我送行。大家和我一一握手话别，等最后到了朱教授时，他突然拿出一个汽锅出来，说是送给我的。为了让我能接受这个礼物，朱先生一路上掩藏得不露痕迹，直到最后关头才拿出来。由于当时飞

机对于行李的重量罚得很厉害，那个超重的汽锅可能算是世界上最贵的一个了。当然，再贵也比不上朱先生的情谊。

## 周培源

之后不久，朱德熙教授告诉我，北大校长要接见我。他就是周培源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这样，我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感受北大校园。眼前的一切全然出乎意料，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 简直是一片荒凉：看不到一个学生；大多数的窗户都破烂不堪；满地散落着碎玻璃以及经过很长时间堆积起的厚厚一层秋叶。

朱教授带着我去一个雅致的湖畔小亭子小坐。湖是北大著名的未名湖。周教授一个人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除了惯常的一些小玩笑，实在没有太多可说。 当时是 1973，文化大革命已经快到尾声了。然而，对北大的巨大破坏已经铸就，要想重新恢复到往日的光景看来是需要很多年的努力了。

## 兰州

邀请方很热情地给我安排了一次旅行，让我有机会多看看中国。其中一个地方是丝绸之路上的兰州。在兰州的第一个早晨，我起得很早，刚刚拂晓。我想早一点亲眼看看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中国有一句俗语：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有一点像 19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西进运动的先驱们印在马车上的一句标语：California or Bust! 或许，在我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些。

然而，我并不清楚应该向哪个方向走。正好，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婆婆，她的工作大约是管停放自行车。大概是由于太早的缘故，她显得比较清闲。从她那里我打听到了黄河的方位。我们也顺便聊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她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我是从外国来的。之后，我看得出她陷入了片刻的沉思。最终，她道出了她的疑惑，那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说外国话了？”

这些也勾起了我对于祖母的怀念。由于父母很忙，我基本上是祖母一手带大的。1948 年家里要带我去美国，祖母就很担心：“外国可是要说外国话的呀！小孩子去外国一定要先学外国话啊。”于是，她到处找人来教我外国话，在她心目中，外国话都是一样的，随便找一个外国人就可以了。结果，找到一个南斯拉夫人，他讲一口有着浓重斯拉夫语口音的英语，等我到美国的时候，刚开始说的英语没有人听得懂。

## 苏州

在我旅行的沿途各地，当地的人们都很热情地招待我，带我参观。在苏州的主人是一个大约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很热情，很诚恳，也相当直率。我记得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虎丘稍作停留。我提起来这里有很大的旅游潜力，旅游在很多国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等等。让我惊奇的是，年轻人马上变得很严肃。我想我一定是触到当时很敏感的一根神经了。年轻人很严厉地反驳我说：“那可是一条亡国之道呵！”现在想起来，他的想法和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是密切相连的。

岁月荏苒，时光变迁！去年八月，我有幸到云南接触到许多少数民族。就是最小的村子也都在争着要从观光客那里得到实惠，常常不惜放弃他们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知道：有所得，必有所失。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好文化的传承呢？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待了一个月后，我不得不返回 Berkeley 教课了。一个月实在是太短了，甚至来不及消化这些很小的人与事的剪影。在我回到 Berkeley 后不久，华盛顿的 Linguistic Reporter 请我写一个到中国的观感，我很高兴地把自己对中国的好感写给他们。不久，美国政府来人向我作调查。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很符合那种特殊的调子：又高又壮，还穿着一身黑衣服。带着点礼貌的暗示，他问我是否有些其他的“有用”的关于刚刚访问过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信息要报告。当我很干脆地告诉他“没有”时，他马上就不见了。在此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好心约我签名对中国的种种做法表示抗议，但我都拒绝了，在这次访问之后，我更觉得自己是对的。

文革以后，许许多多已经改变，整个世界正在目睹一个有序的转型发生在中国。她的经济日新月异，她的人民有了新的信心。很难想象这一切脱胎于我三十年前见到的混乱与荒凉。不过，无论如何，那个剧变的年代在亿万中国人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我个人而言，寥寥几幅剪影唤起的感觉或许是别样的，然而依旧鲜活。无数次生活的转换，无数个动人故事的流传，或许有着同样的因由。

[王士元教授 1933 年生于上海，1960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博士。《中国语言学报》创刊人及主编。数十年来，王教授致力于推动中国语言学研究，他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在语言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王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届会长。现为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学系语言工程学讲座教授。]

[部分英文原文刊载于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EE-Concord> , 2003. No.12:7-8. 汪锋 译]